

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历史、现状与前景

——庄国土教授访谈录

庄国土:厦门大学历史学、政治学博士生导师、特聘教授;华侨大学讲座教授。现任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马来西亚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非洲研究院执行院长。庄国土教授还担任了一系列的国际与国内学术组织的职务。如世界华人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udies of Chinese Overseas)常务理事和中国分部主任、中国东南亚学会会长、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副会长等,还担任厦门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科职称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等校内职务。除此之外,庄国土教授还是:意大利《明清研究》编委会常务编委、香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委、《世界历史》、《当代亚太》、《东南学术》、《厦门大学学报》、《海外史研究》、《东南亚南亚研究》等刊物的编委,荷兰皇家科学院高级人文研究学会的终身会员。

庄国土教授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两个:一是华侨华人现状及其在亚太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华商网络、侨乡调查、华人与中国关系、新移民、华侨华人地位及发展趋势);二是17~20世纪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出版的华侨华人研究方面主要著作有《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海峡两岸与东南亚:当代华商经贸网络》、《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的变化》、《族谱和海外华人移民研究》、《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东南亚华侨通史》、《巴城华人和中荷贸易》,主编了《世纪之交的华人》(上、下册)、《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与华侨华人》、《中国侨乡研究》等著作。曾获得中国国家优秀图书奖、国务院侨办一等奖、教育部优秀社科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福建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厦门大学最高学术奖——南强奖等重要奖项。

2011年10月26日,庄国土教授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了本刊的专访。以下是访谈的具体内容:

问:庄教授,您能否给读者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历史?

庄:回顾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发展历史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东南亚的学理性研究恰恰是从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研究开始的,时间大概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基本上没有,有的只是一些零星的记载。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华侨、华人问题,早期的中国东南亚研究成果大多为华侨华人研究。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实际上是起步于华侨华人研究。

在宋、元、明、清时期,涉及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问题的著作寥寥无几,这一时期的著作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只有记述,尚无学理性研究。如18世纪末的《海录》、《海岛逸志》,19世纪中期的《兰茅公司历代年册》、《开吧历代史记》等。真正开始学理性研究海外(东南亚)华侨华人的是19世纪中期在南洋等地开展研究的一些西方学者,如施莱格(G. Schlegel)的《天地会》(1866年)、高延(De Groot)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1885年)等。晚清时期,中国驻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使领馆开始整理和记载当地的华侨华人资料,这一行为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侨史研究。再晚一些,如梁启超的《美国华工禁约记》(1904年)、《中国殖民之八大伟人传》(1905年)、羲皇正胤的《南洋华侨史略》等,使得侨史越来越接近学理性研究。

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进入学理性研究阶段,并很快就出现了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高峰时期。与此同时,华侨华人研究的兴盛也进一步带动了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20世纪20、30年代,一批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进入侨史研究领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1929年)、丘汉平的《华侨问题》、李长傅的《华侨》(1927年)、《中国殖民史》(1937年)、金陵大学教授刘继宣和讲师束世澂合著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5年)等。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受过西式教育,在学术上兼具中西之长的留洋学者及著作,如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938年)、芝加哥大学吴景超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1928年)等。此外,这一时期和稍后一段时间内,一些曾亲身参与

过辛亥革命及国民革命的华侨革命家也著书立说,论述华侨华人与革命的关系,如张永福的《南洋与创立民国》(1933年)、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939~1948年)和《华侨革命开国史》(1946年)、胡汉民的《南洋与中国革命》。在这一时期,一些研究组织和专业刊物也相继出现。1927年,在李长傅、刘士木、丘汉平等学者发起成立暨南大学文化事业部,1930年改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1934年又改称海外文化事业部。同时创办《南洋研究》(1928~1944年)、《华侨情报》。北京平民大学领事系的何海鸣创办《侨务旬刊》(1920年),共出版141期。

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种种原因,华侨华人研究一度陷于低潮。如其他国际问题一样,华侨华人研究也属于敏感领域,非经特别安排,一般学者轻易不会去触及,原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随1951年暨南大学停办而解散。而一些大学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参与华侨华人研究较多的学科,大部分被关停并转,研究人员不再从事华侨华人研究。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东南亚华侨问题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华侨华人研究重又获得发展机遇。1956年,中央侨务委员会和厦门大学联合组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主要研究东南亚和华侨华人问题。一批厦门大学的资深学者,如林惠祥、韩振华、陈碧笙、庄为玘、黄文鹰、何启拔等进入南洋研究所,朱杰勤、姚楠、田汝康等国内知名学者也成为南洋研究所的兼职学者。1957年,南洋研究所创办《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发表了国外一些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成果,如巴素(V·Purcell)的《东南亚华人史》,史金纳(W·Skinner)的《泰国华人:史的分析》,岩生成一的《下港(万丹)唐人街盛衰变迁考》等。195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成立东南亚研究室,以东南亚历史研究为主,间或从事华侨研究。1960年,在朱杰勤等著名学者的推动下,暨南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所,不定期出版《东南亚研究资料》,刊登部分华侨研究译作和少量研究论文。

但是,随后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各地的华侨华人研究工作基本停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呈现出华侨华人研究全面复兴、各类涉侨研究机构和学会纷纷成立、大批学者和学术爱好者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盛况。除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在1972年复办外,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

如中山大学的东南亚历史研究室(所)、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及广西、云南社科院的东南亚研究所都是在改革开放后相继复办的。1981年,两所国务院侨办管辖的大学即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均分别成立了专门的华侨华人研究所。1983年福建社科院成立华侨研究所。1984年,中国侨联成立华侨历史研究所,这些专设的华侨研究所,迅速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生力军。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也先后成立华侨华人研究机构,尤其是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主持的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迄今已出版各类华侨华人研究著述40多种,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机构涉侨著作最多者。一批华侨历史学会也陆续在北京及广东、福建、广西等主要侨乡省份成立。

当前,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堪称热点领域,涉侨学术机构多达20余个,专兼职研究人员300~400人,研究队伍堪称壮观。每年在大陆发表的华侨华人研究论文达数百篇,著作10多种。

问:感谢您刚才对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回顾。通过回顾,您认为当前的中国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有哪些特点?

庄:我认为,当前的中国人华侨研究有以下一些新特点:

第一,向多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

多学科研究华侨华人,不但是指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华侨华人”需要以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也指研究对象本身也包含各学科的特定研究内容。这一特点是由华侨华人研究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所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多为历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华侨华人历史。当前研究华侨华人者,则以经济、社会、民族和国际关系学者居多,政治学、心理学、宗教学、新闻学、语言学、统计学等几乎所有人文社科各学科的学者,也加入华侨华人研究行列。经济、社会、民族、移民、政治、教育、侨务等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均远多于历史类的论文。由于华人群体最终将归入当地民族之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民族学视角考察华侨华人问题。于是,运用民族学理论研究华侨华人,俨然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之一。多学科研究华侨华人现状的趋向的出现,不但显示了研究方法的提高和研究领域的扩展,而且说明了华侨华人本身的重要性在日益提高。

第二,继续重视原始档案文献整理和大型工具书编辑。

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研究的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曾相继出版了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共10辑)(1980~1985年),林金枝、庄为玘

主编的《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共3辑)(1985~1994年),刘玉遵、黄重言、桂光华、吴凤斌主编的《“猪仔”华工访问录》(1979年)。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视档案和文献整理继续成为华侨华人研究的特色之一,福建档案馆编辑的《福建华侨档案史料》(1990年),赵和曼主编的《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1990年),周南京、梁英明、孔远志、梁敏和编辑的《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资料汇编)》(1998年)和庄为玑、郑山玉主编的《泉渊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1998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与莱顿大学历史系合作的《18~19世纪巴达维亚华人公馆(侨领府)档案》编校项目(目前已出版7册,计划出版20册)相继出版。周南京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是目前为止出版的最大型的工具书,全书共12卷,字数达3500万字。另外,从1980年开始,南洋研究院(所)共编辑出版了7册《华侨华人研究中文论文目录索引》和《华侨华人研究中文书目》。

第三,重视微观研究与实证资料的获得。

以往的华侨华人研究的资料基础多为中外已刊文献。由于资料有限,大量的研究成果多涉宏观主题,推论多于实证,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个别案例举证重于计量统计分析。近年来,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和资金投入的增加,深入的田野调查方法越来越多,尤其是对新移民研究和华商企业研究方面。

第四,国际化程度有所提升。

首先表现在积极参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国际学术活动;其次,近年来,中国大陆涌现出一批用英文、日文写作的中国学者,他们基本上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再次,相当多的中国学者的研究项目获得诸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福特基金、丰田基金、日本文部省基金、德国学术基金等各类国际著名学术基金会的支持,这表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水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国际认可。

第五,学理性研究与国际政策咨询的良性结合。

本世纪初以来,国务院侨办对华侨华人的学理性研究空前重视,尝试学理性研究与国家侨务政策咨询相结合的侨务政研新路,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学者与官员的直接对话,政府侨务部门借助学理性研究拓展侨务政策研究的举措,不但使侨务政策更具科学性和前瞻性,也为中国华侨华人的学理性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问:谈完了当前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特点,能否接着谈一下中国华侨华人研究存在的问题?

庄: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水平有很大提升,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一些诸如创新能

力弱、文献单薄、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首先,低水平重复和创新能力不足。

近10年来,尽管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著作多达近百种,论文数千篇,但很多著作与论文未能充分了解和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或未能搜集新资料与信息,而是老调重谈,甚至低水平重复。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缺乏系统的学科理论训练,思辨能力不足。有的研究人员缺乏外语能力,使得研究者缺少和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和掌握相关文献和资讯的能力。仅举数例:在人物研究方面,仅在2000~2003年,国内就发表了650篇以上的论文,著作也达数十种,仅关于印尼华商林绍良的相关著述至少在30种以上,但内容大同小异,所引用的资料也基本相同。关于华商和华人经济状况的研究也较为泛滥。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后,几年内关于“华商与东亚金融风暴”的论文与相关著作就多达数百种,这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

其次,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

相对能力和条件而言,当前研究者急功近利的心态更是创新能力的大敌。急功近利的心态使研究者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创新性研究,满足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者急功近利心态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一是治学态度的问题;二是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存在问题。以创新为目标的科学研究需要潜心理首,十年磨一剑。华侨华人研究涉及多种学科和中外文资料,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资料收集,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由于现实利益的影响,研究者往往急于出成果,尽快兑现实际利益,这就造成研究人员急功近利。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也容易导致研究者急功近利。我在这里就不多言了。

最后,第一手资料掌握得不够。

第一手资料的掌握直接关系到能否产出创新性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或许是由于科研评估不重视资料整理等原因,越来越少的学者愿意从事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就华侨华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而言,中文文献的整理仍有待于发掘。中国学者对已刊历史文献和方志所载涉侨资料已多有利用,但未刊清朝档案和民国档案中,仍有大量未被利用的涉侨资料、私家著述。西文档案文献,尤其是欧洲各东印度公司档案,列强的有关东南亚殖民地档案,涉及东方事务的外交档案和华工档案,近年来国外的外交解密档案等,中国学者仍很少利用。因此,这方面可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问:作为国内一位知名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专家,您认为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理论问题?或者说哪些问题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另外,您认为中国的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前景如何?

庄:华侨华人研究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一直在充分利用华侨华人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同胞提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最急需的资金、现代企业和国际营销网络。中国与东南亚的双边贸易在2006年已达2000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与东南亚华裔的贸易。东亚地区华裔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速,成为支撑中国东亚外交的经济基础。华侨华人研究涉及移民、外交与国际关系、外经外贸、投资、民族认同及中华民族的软实力等方面,这些方面无不与改革开放的国策息息相关。因此,与其他学科相比,华侨华人研究不但具有重要学科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对当前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文化承继和嬗变、社会和族群认同、移民与融合等问题作深入研究,是国家利益和学科价值对华侨华人研究学者提出的更高要求。

具体而言,我认为以下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第一,新移民研究。新移民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华侨华人的分布、数量、籍贯与职业构成、认同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对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理性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近年来,相对于其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关于新移民的研究也取得了较高的学术认可度。但是,现在有关“新移民”的论文,多就事论事,鲜有以比较视野研究中国新移民与其他国家新移民异同的成果。今后如能在比较研究上有所突破,将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认同与融合。认同和融合问题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和最终归宿。华侨华人的认同取向和融合程度,与其主观倾向和客观环境息息相关。近30年来大量中国新移民进入华侨华人社会,对华侨华人的认同和融合带来新的冲击。新老华人之间的认同差异也成为新的研究课题。因此,研究不同地区华侨华人的认同和融合的同异及其条件和趋势,不但能把握华侨华人社会发展脉络和方向,而且有助于理解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本质。此外,基于共同的文化和相似的价值观念,中国学者在理解华侨华人认同与融合方面也具有相对优势,有条件作出较国外同行更好的研究成果。

第三,关注全球各地华人的关联性和国际流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华人资金、技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包括港台在内的中国新移民大规模流向世界各地。与此相关的是,各地华侨华人社会之间的联系也空前密切。华人移民网络,也呈现区域化和全球化趋势。因此,研究各地华人社会之间的关

联性,尤其是与中国在资金、商贸、劳动力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把握当前各地华侨华人社会生存能力、发展趋势及国际流动有重要意义。

第四,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移民和侨民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波兰、爱尔兰、俄罗斯、意大利、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也有大量的人口移民海外。这些国家的移民,也同样面临与华侨华人相似的生存和发展、认同和融合、与祖籍地关系等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仍鲜见研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移民和侨民问题的有分量的成果。适当研究其他国家的侨民、移民问题,有助于我们比较华侨华人的处境和发展趋势。

第五,侨情变动与热点跟踪。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大规模新移民流向世界各地,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日益密切,这一切都使得海外的华人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侨情变动。因侨情变动引发的各种热点问题,如移民身份合法化、新侨与老侨的冲突乃至与当地主体民族的商贸摩擦、华侨华人的安全和救助、两岸关系对华社的影响等,都关系到华社的生存与发展、中外关系的稳定及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如能及时把握海外侨情的变动,跟踪热点问题,提出前瞻性对策建议,将对我国的外交和侨务工作作出重大贡献。

至于说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会有何种发展前景,我认为,由于华侨华人研究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门领域。因此,华侨华人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训练有素的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只要我们克服急功近利心态,发挥中国学者的优势,把握华侨华人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将有望在国内外学术殿堂占据一席之地,也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问:最后问一个小问题:您对目前正在从事或者未来有志于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事业的年轻人有些什么建议?有些什么期望?

庄:青年学者的当务之急是要克服学术浮躁的毛病,要从基础做起,不断更新理论和研究方法,发掘新史料。与此同时,青年学者还要对国际学术前沿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并最终实现学术水平的超越。我希望青年学者能够打好学术研究的基础,练好基本功。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勤奋一些,有了天分和勤奋,我们的青年学者才能更快地成长起来,我国的华侨华人研究才能后继有人,保持长时间的兴盛。

(郭平 整理)

[责任编辑:胡潇文]